

翻译行为限制性与创造性的文化透视

唐健禾

(四川理工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没有文化的支撑,则没有翻译行为的真正运行与实质性实施,而不同的国家的民族活动多样性与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多样性,通过翻译行为的实施去缩小差异,达成语言间的妥协。奈达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归纳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实则为两种语言转换时必定碰到的文化障碍,这种文化障碍在翻译行为的实施中则可视为文化限制。翻译行为的文化创造可在归化策略(转换法)、异化策略(直译法)、文化调停策略(意译法)、译注法、音译法、转换与重写法这6种方法中得到体现。

关键词:翻译行为;限制性;创造性;文化透视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3-0060-05

新世纪的发展步伐不断推进,国际接触与交流日益频繁,翻译行为几乎随处可见。然而,翻译绝不是一种任意发挥、随心所欲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语言文化行为。通过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始终伴随着翻译行为的存在,且二者相互交融,缺一不可。笔者曾撰文指出:“限制性与创造性之间虽对立但又互补,创造性需要限制性贯穿于翻译行为过程始终,限制性促使创造性能在更高层面上更加完美地既体现出译者对原文的忠实,又展现出通顺的译文。”^[1]换句话说,人类自有翻译行为以来,限制性与创造性则始终贯穿于该行为之中,因此,没有限制性的约束和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沟通,不同文化之间就难以实现真正的交流与融合。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浪潮的不断高涨,翻译事业还将得以更加突出地推进,与此同时,文化对翻译的支撑功能愈发突出,对翻译的影响因素愈发彰显。人们必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文化与翻译的

关系,只有完全明确地把握翻译的性质,更好地指导自己有效实施翻译行为,方能达到准确传达意义的目的。

一、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密切联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大批国际顶尖的文化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对翻译产生极大的兴趣,进而发表了不少深刻的翻译理论见解。与此同时,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也走出原先仅仅将翻译行为的研究着眼于语言文字转换之上的狭隘观念,而将视野放置于文化交际和比较文化等更加宏大的层面上去研究和审视翻译。这就是在翻译界被称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这么一种特别的景象。他们的观点集中表现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2]时至今日,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这个

收稿日期:2012-04-0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项目(10SA110);四川省教育厅教改项目(P09253)

作者简介:唐健禾(1955-),男,四川富顺人,教授,四川理工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对比。

网络出版时间:2012-4-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418.2244.006.html>

被简称为“文化转向”的景象更加准确地揭示了翻译行为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加明确了翻译学科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它对于当今的翻译学的发展和完善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对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给予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某一民族丰富的文化信息，甚而包括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蕴含着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事实正是如此，“任何文化交流都必须以翻译为前提，离开了翻译，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就不可能实现。”^[13]究其原本，“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14]翻译作为在人类不同语言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行为，是依托于语言而完成其自身任务的，因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的语言活动。然而，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决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在历史长河中，语言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反映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发挥了在交流、传播、延续和发展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工具性作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15]这就更为明确地表明，基于信息沟通与思想交流所需的翻译行为的表层载体是语言，但其底层基础则为文化。没有文化的支撑，则没有翻译行为的真正运行与实质性实施。美国著名汉学家 John Deeney (李达三)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16]

来源于拉丁文的英语单词 culture，本为“耕种”、“栽培”等意，后逐渐衍生为现有的意思。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诠释繁多，其定义多达一百六十余条，但其要旨均离不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人类所共有的文明精神，英国学者泰勒(E.B Tylor, 1871)给“文化”下了个最为权威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性整体。”^[17]人类具有着共同的本质性的创造性能力，这种能力推动着文化的前进与发展，体现出了人类共同的文明精神。虽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分别孕育着不同的文化，但这些不同的文化却体现着

人类文明的本质性能力，也就是从深层意义上反映着人类的共同能力。然而，不同的文化毕竟体现着局部的同一性，因为不同的国家的民族活动多样性与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出多样性，这就是文化差异渊源的形。这种文化差异在以翻译为桥梁进行不同文化之间沟通时则会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18]因此，不同的国家间语言的迥异是存在着的现实，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也是现实，文化间交融时的碰撞和冲击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只有面对这一切，通过翻译行为的实施去缩小差异，达成语言间的妥协。

二、翻译行为所面临的文化限制

翻译是在不同语言间进行意义转换的行为。然而，不同语言所属于不同的语系、有着不同的文字形式和语法结构，再加上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与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等的不一，因而引起思维方式的差异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则直接导致翻译不能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必须是在形式转换基础上突出意义的传递。在这种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既为客观要求、又是主观需要的限制，这就是以翻译标准为主要标志的对译文提出要求的限制。这种限制表面上是翻译标准所要求的限制，实际上则为在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文化传递的需求所产生的限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则可认识到这种限制其实就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碰撞与冲击。因此，“必须以‘忠实’与‘通顺’为前提，既能正确地吸纳理解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精神，又能准确将其语言文化实质传达到译语当中。”^[11]

奈达曾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归纳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基于以上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实则为两种语言转换时必定碰到的文化障碍，这种文化障碍在翻译行为的实施中则可视作文化限制。以下根据奈达之归纳作出相应阐述。

1. 生态文化(Ecology)

一个国家所处的生态环境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化。其生态环境在于该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地理位置所导致的气候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动植物生存的环境条件，由此影响到该民族的文化，使其

鲜明的地域性蕴含于文化之中。作为岛国的英国,基于历史上航海业较为发达的原因,因此语言中出现诸多与海洋、船和水有关的短语,如:“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sail before the wind”(顺风航行)等。中国则为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既有丛山,又临海面,因此,“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到黄河心不死”,“人心齐,泰山移”等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地域色彩。英国古代耕地主要靠马,马在英美文化中则为勤劳与吃苦的象征,而中国自古耕地靠牛,因此耕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着勤劳。因此,英语表达“as strong as a horse”,而译为汉语则为“力大如牛”。

2.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任何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产品都是文化的物质载体,而衣食住行是物质文化中最为主要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常常直接反映着人们生活中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从物质文化方面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实可看出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从服饰的角度看,英语里有“jacket”(夹克衫)、“tuxedo”(燕尾服)、“cowboy suit”(牛仔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长衫”(cheongsam)、“中山装”(Chinese tunic suit)。从食品的角度看,英语中有“salad”(色拉)、“coffee”(咖啡)、“hamburger”(汉堡包)、“hot dog”(热狗)等;中国食品“汤圆”、“粽子”和菜名“全家福”、“龙凤会”等,无不体现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追求祥和的情感,虽可分别意译或音译为“rice dumpling”、“zongzi”、“stewed assorted meats/hotchpotch”、“stewed snake and chicken”,但实在难以在英译中将其承载的文化含义和韵味再现。

3. 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

一个民族和社会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均由社会文化所承载,具体体现于人们的交往与关系之中,包括各种场合的见面礼貌行为和用语,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称谓用语,甚至涉及到人们对于颜色词的联想。如汉语里对于亲属的称谓非常准确,且都可用于直接面称,分为伯、叔、舅、姑、姨、婶等等,而英语对于亲属的称谓粗略含混,几乎只用“uncle”和“aunt”通称。英美人见面打招呼总是“Hello!”、“Hi!”、“How are you?”、“Good morning!”,而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常用“你去哪儿?”、“吃饭了吗?”、“干什么去?”其实这些招呼并非真要问点什么,而只是打个招呼的托词而已,但西方人却对诸如此类的问语非常敏感,且回答也十分认真。英汉对于颜色的含义联

想差别很大,英语中说“to see red”意为“火冒三丈”或“大发脾气”,但汉语说“开门红”则使人联想到好事总是伴随着事情的开端。

4. 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

几乎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由此宗教文化在人类文化之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广大民众心中存留下了浓厚的影响,在语言中显示出了明显而特殊的痕迹。西方国家的人们大多信奉基督教,笃信上帝创造世界,以为世上一切均照上帝旨意所安排,由此在英语中就出现不少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表达,如“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bear one’s cross”(背十字架)等。从历史上看,中国民众一直接受着佛教、道教、儒教的影响,语言中就有诸多这些宗教相关的表达,如与佛教有关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借花献佛”,与道教有关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悬壶济世”,与儒教有关的“三纲五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

不同的语言分属各自不同的语系,这就使语言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语调层面、语法层面,以及组字、发音、修辞、结构等方面。英汉两种语言具有各自的独特形式,既显示出各自的语言美感,同时也给两种语言的转换带来困难和障碍,甚至形成极大的限制,影响到可译性的程度。如汉字一个字一个音节,再加上四声音调,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展示出汉语独有的双声叠韵美,欲在汉译英中传达其美其韵则是难上加难;与此同时,英语的单词重音、句子重音、连读等所构成的轻重缓急和意群等所带来的特别韵味也实难在汉译中得以传达。

三、翻译行为所包含的文化创造

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沟通桥梁,必然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间面对差异、寻求语言的转换,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在此过程中,译者必定会展示出自己的创造功能,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翻译行为的创造性。

中西文化的差异必定导致汉英两种语言语用意义的不同,译文与原文在语用意义上不完全对应或完全不对应的状况常常出现,因此,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必然需要根据中西方语言文化上的差异,选取合适有效的策略与方法,以实现译文与原文间的语用等效,真正实现翻译行为的原本目的。“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差异性

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9]在此过程中的思维转换和文字表达程序则体现着翻译行为的文化创造。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文化创造理解为对文化进行创造或是创造某种文化,而应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在文化层面上所进行的语言创造。这种创造需要以语言理解为基础,对两种语言所依附的文化内涵充分领略,解其含义,悟其深刻,采撷要旨,获取精华,联想对应,巧妙再现。王佐良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10],只有成为了如此的文化人,方能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之间呼风唤雨,游刃有余。

奈达在其《语言·文化·翻译》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功能对等”理论,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上。翻译是伴随着文化交流而出现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种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则可将翻译的结果视为文化再现(culture reappearance)。文化再现应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旨,一是要再现源语文化特色,也就是译者不能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民族的文化色彩,务须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忠实地将源语文化再现给读者;二是在再现源语文化信息时不须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而是要在深刻领略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之基础上再现原文。现从以下六种方法进行论述。

1. 归化策略(转换法)

是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译者或使用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象来生动地道地传达原文内容,或把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转换成译语中带有同等文化色彩的词语(物象),这就是所谓的译者向译文读者靠近的策略。如将“Spend money like water”译为“挥金如土”,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译为“Every potter praises his own pot”。

2. 异化策略(直译法)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使用相当于原文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在传达中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特征,以使读者的文化视野得以开阔,相互丰富语言表达,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就是所谓的译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策略。如直接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译为“The monk may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can't run with him”,将“Ivory tower”译为“象牙塔”。

3. 文化调停策略(意译法)

是以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用跨文化的所谓“对等”词语来表达源语的文化信息。然而,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源语文化的意象

损耗或缺损。如将“It is a Greek gift to you”译为“这是图谋害你的礼物”,将汉语成语“得陇望蜀”译为“One conquest breeds appetite for another”。

4. 译注法

是处理原文中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典故的文化色彩的方法,常常是先直译相关词语,然后再使用增词或加注等方法说明或解释文化背景。此方法不仅可以将原文的文化色彩保留于译文中,而且有利于读者对原文物象的理解。如将具有历史典故的表达“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5. 音译法

是针对一些源语文化中特别的物象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合适的替代语,而只能使用音译的方法直接移植到译语中去,这样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又可通过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译语语言文化。如将“功夫”译为“kongfu”,将“叩头”译为“kowitz”,将“hysteria”译为“歇斯底里”。

6. 转换与重写法

常常是指在汉译英时“译者根据源语与译语思维模式、语言结构的差异,对源语思维进行洗牌,按照译语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句子结构及语篇结构对源语进行重组,重组时用源语在脑中重写原文,然后再将重写后的符合译语思维和语篇结构的文本以译语加以重写。”^[11]如:“咫尺西天”原译为“very close to the western heaven”,意向重组后转换为“西方乐土一步之遥”,最终译语重写为“a step away from the western paradise”。

四、结 语

不断发展奋进的中国正在更加广泛的进行国际交往,既加强“译入翻译”(in-coming translation),更强调“译出翻译”(out-going translation),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研究与探讨也随之不断深化和加强。应该明确,“文化的全球化应该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充分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种族的差异性。”^[12]因此,只有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方能促进交流与沟通,方能促进理解与融合,为此目的,对于翻译行为限制性与创造性和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必然会更加深入。只有在如此的不断探索与发现中,方能更好地推动实践、完善理论,为人类间更加频繁的交往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从而“促使我们达到人类兄弟之情的一个高级阶段”^[13]。

参考文献:

- [1] 唐健禾.对立而统一:论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J].外国语文,2010,(5):76-79.
-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62.
- [3] 傅敬民,张顺梅,薛清.英汉翻译辨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4] Nida,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110.
- [5] 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M].上海:开明书店,1947.
- [6] Deeney,John.Biculturalism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112.
- [7]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 [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8.
- [9]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64.
- [10] 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中国翻译,1984,(1):2-6.
- [11] 王爱琴.入乎其中,出乎其外[J].中国翻译,2012,(1):99.
- [12]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30.
- [13] 高一虹.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3):182-189.

责任编辑:万东升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estriction and Cre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ANG Jianh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Without cultural support, there would be no real operation and substantial implement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The diversity of national activities and concept leads to the diversity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and for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can narrow the difference and reach a compromise between languages. Eugene Albert Nida has summarized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languages from ecology, material culture, social culture, religious culture, and language culture aspects. These cultural factors substantially are cultural barriers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two languages. These cultural barriers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 restric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The cultural creation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can be represented in the following six methods, i.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conversion method), adaptation strategy (lite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mediation strategy (liber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notation method, transliteration method, and conversion and rewriting methods.

Key words: translation activity; restriction; crea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